

空間的文化形式 與社會理論讀本

READINGS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

夏鑄九 編譯



封面版畫：河畔家園・奚淞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明文書局

空間的文化形式 與社會理論讀本

READINGS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

夏鑄九 編譯

明文書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84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平裝一冊定價新台幣三五〇元

編譯者：夏 鑄 九
出版者：明 文 書 局
發行人：李 潤 海
台北市敦化南路492號
印製所：凡成印製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大路486巷10弄27號
發行所：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字1993號
地 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7 F
電 話：3619101・3318447・3754679
郵 撥：01436784號 明 文 書 局
傳 真：3619101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再版

Ming Wen Book Co., Ltd.

7F No.49, 1st Sec., Chung King South Road,

Taipei, Taiwan, R. O. C.

ISBN 957-9509-12-3

省與批判的力量。在知識之生產層次上，這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呢？

所以，為了反省、批判與實踐能力的建立，我們需要重新掌握理論。在這樣的時勢下，或許，對空間與社會關係之理論提供一方法論的分析是必要的基礎性工作。經由一認識論上的批判，我們檢視不同的社會理論如何處理空間文化形式與社會構造的關係，來提供一種對概念與方法論操作方面的科學活動的演練。這本讀本是為了這樣的課程所準備的“中文”部分讀本，因此，它本身有其不能單獨存在的基本條件。其不能單獨存在一則是中文譯文只是重要閱讀材料的一部分；二則在於這本讀本之主要焦點在於空間的文化形式，它需要與我們另外一部分針對空間結構的讀本相結合才顯得較完整。

那麼，我們要如何使用這讀本呢？它是如何編輯起來的？閱讀的限制條件在那裡呢？由於讀本本身是伴隨我們的“理論課程”而存在的，它本身沒有內部相互關聯的結構。對應著“理論課程”的架構，它的編輯做法有幾個重點仍然可以一提，以助於使用這讀本：

(一)有關方法論方面的基礎性文章是全書之基礎。它包括了頭三篇認識論批判的文章，像愛倫·史考特(Allen J. Scott)的“社會的空間基礎之論述的意義和社會根源”(The Meaning and Social Origins of Discourse on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奈迪克·泰默(Necdet Teymur)的“總導言”(General Introduction)一是其著作“環境論述”(Environmental Discourse)的總導言，曼紐·卡斯提爾(Manuel Castells)與愛米里歐·伊波拉(Emilio de Ipola)的“認識論實踐和社會科學”(Epistemological Practice and the Social Sciences)。雖然某些文章的部分不無存在著形式主式的陰影，但是做為頭腦體操的目的而言，仍然是值得推荐的。

(二)涉及空間的文化形式方面的社會學分析是努力的主要

題旨所在，將摘要翻譯。這方面的代表文章，像卡斯提爾的“都市象徵”(The Urban Symbolic)與“都市中心性”(Urban Centrality)，這是他早期的作品，“一個跨文化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Change)就是他最近的成果。這是批判的都市社會學，或者說政治經濟取向的都市研究方面的例子。還有，威尼斯學派的曼弗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的文章，像“歷史的計劃”(The Historical Project)，與“新君士坦丁堡—人文主義時期(1450—1509)威尼斯的“革新”表徵”(The “New Constantinopl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novatio” in Venice during the Humanism (1450—1509))，以及狄米垂·波菲瑞阿斯(Demetri Porphyrios)的“關於批判的歷史”(On Critical History)，都代表了不同於傳統的建築史之研究方法。此外，米修·福寇(Michel Foucault)的兩篇有關空間的文章：“空間、知識與權力”(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以及“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Texts and Contexts of Other Space)以及戈溫德林·萊特(Gwendolyn Wright)與保羅·雷比諾(Paul Rabinow)討論福寇作品的“權力的空間化”(Spatialization of Power)一文，也都可以覺察到它們對傳統論述的瓦解力量。最後，葛迪勒(M. Gottdiener)與亞歷山卓·拉哥波羅絲(Alexandros Ph. Lagopoulos)的城市與符號(The City and the Sign)之導言，將社會記號學的研究方法勾勒了一個輪廓，對空間的文化形式分析則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起點。

(三)對重要理論傳統的批判。這部分的文章包括在讀本中的有：泰默爾對傳統英美實證主義環境—行為研究的批評，見“實質環境的經濟意義”(Economic Signification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艾倫·普瑞德(Allan Pred)的“結構化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

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則是對現象學所提出的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在方法論方面的質疑。這部分的文章最能夠說明讀本本身的不獨立性。有大部分的批判文字，一則由於文字較為簡易，即使是不翻譯，也容易掌握；二則由於原文為專書，分量過多，一時不易完全納入，只有等待下一版時再做增加了。像尼可斯·哈齊尼可拉 (Nicos Hadjinicolaou)、皮爾·馬歇雷 (Pierre Macherey)、泰雷·伊格頓 (Terry Eagleton) 以及賀龍·巴赫德 (Roland Barthes) 等人的作品。

前面所提的原文本身的難易程度，其實是本書編輯的重要原始動機之一。由於部分文章，原文極晦澀或者是由於寫作風格造成可讀性極低，這是我們為何要出讀本的原因。所以，一些行文清晰的文章反而暫時放棄了，像亞歷山大·克里斯多夫 (Alexander Christopher)、開文·林區 (Kevin Lynch) 與環境一行為研究方面的文章及其批評文章。可讀性不高的文章我們優先翻譯，像塔夫利的文章 (如“歷史的計劃”)，卡斯理爾早年的文字，普瑞德的文字，福寇的文字都是這方面的例子。也正因為這個原因，讀本最大的限制就是翻譯不盡理想。當然，由於譯者主要都是碩博士班學生利用方法論課程的讀書機會翻譯而成的，他們的英文程度高低不一，我本人的能力與時間也僅能略加修正，即使在最後打字結束時，仍然不斷發現翻譯不妥的錯誤，更遑論信雅達了。也由於原文大多為值得一再精讀的文章，譯文的提供也只是提供了在與原文相比照閱讀時，增加讀書的效果罷了。因此，翻譯的錯誤也就比較容易發掘了。這種翻譯的讀本，本來係課堂內傳閱即可的教材，目前把它出版流傳，也無非是為了提供成品更多的使用機會而已。那麼，錯誤的地方也就只有希望在再版時再修改了。

五十四年前，建築史研究的先行者林徽音女士就提醒我們：“盡信書不如無書”。對任何的讀本言，這都是最需要的教訓吧。畢竟，形式主義 (對理論的形式主義) 與教條主義是最危險的敵人，它就藏身在這些正文本身之中。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READINGS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

目 錄

編者序言

夏鑄九

- 一、社會的空間基礎之論述的意義和社會根源…………… 1
 - The Meaning and Social Origins of
Discourse on the Spatial Foundation of
Society
 - 蔡厚男、陳坤宏譯
 - Allen Scott
- 二、環境論述（總導言）…………… 17
 - General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 米復國譯
 - Necdet Teymer
- 三、認識論實踐和社會科學…………… 55
 - Epistemological Practice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 張景森譯
 - Manuel Castells and Emilio de Ipola
- 四、都市象徵…………… 89
 - The Urban Symbolic
 - 夏鑄九譯
 - Manuel Castells
- 五、都市中心性…………… 95
 - Urban Centrality

高樹仁譯

Manuel Castells

六、實質環境的經濟意義…………… 107

Economic Signification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米復國譯

Necdet Teymur

七、結構化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
…………… 115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 On the Beco-
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許坤榮譯

Allan Pred

八、歷史的“計劃”…………… 137

The Historical “Project”

張景森譯

Manfredo Tafuri

九、關於批判的歷史…………… 167

On Critical History

蔡厚男譯

Demetri Porphyrios

十、新“君士坦丁堡”——人文主義時期（1450-1509
）威尼斯的“革新”表徵…………… 173

The “New Constantinople” : The Repre-
sentation of the “Renovation” in Venice
during the Humanism (1450-1509)

陳志梧譯

Manfredo Tafuri

十一、權力的空間化：米修、福寇作品的討論…………… 201

Spatialization of Power : A Discussion
of the Work of Michel Foucault

陳志梧譯

Gwendolyn Wright and Paul Rabinow

十二、空間、知識與權力：與米修、福寇對談…………… 211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 Interview
of Michel Foucault

陳志梧譯

Michel Foucault

十三、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 225

Texts and Contexts of Other Spaces

陳志梧譯

Michel Foucault

十四、城市與符號（導言）…………… 235

Introduction (The City and the Sign)

吳瓊芬、陳章瑞、王師、張景森譯

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Ph. La-
gopoulos

十五、一個跨文化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節譯）…………… 257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
al Change

陳志梧譯

Manuel Castells

一 社會的空間基礎之論述的意義和社會根源 *①

愛倫·史考特 *②

蔡厚男、陳坤宏 譯 *③

就所有的文化世界言，知識似乎是與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最為分離。它難道未主張普遍的有効性也未建立在經常視為個人意識的特權之合理判斷之上嗎？

G. Gurvitch, 知識的社會架構 (頁 3)

一、導言

• 知識活動的問題

在本文中的一個企圖是想解讀現代社會（即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空間基礎之理論論述的意義和社會性根源。本文企求去提出的問題，首先以非正式的措辭陳述如下：為什麼地理學者、區域科學家、都市經濟學者與其他學門等都在研究社會事件（social events）的空間模式（spatial patterning）？為什麼有些種類的空間模式被廣泛且深刻地探討，而有些則多少是被遺忘了？為什麼現代社會之空間結構的研究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過些時候，才開始真正吸引學術界的重視？為什麼地理學課題的論述竟圍繞著“科技與理性”對“人文主義與人本價值”這兩個對抗主題呈現極端的兩極化？為什麼都市及區域科學家和學者們熱切地在討論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與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相對價值？為什麼馬克斯和新馬克斯的社會理論現在開始滲透到都市及區域科學的論述？究竟所有的知識活動（intellectual activity）是一科學和哲學研究的自催式邏輯之結果呢？抑只是如果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所可描述之一種必然的現象？

• 都市及區域論述 是一歷史決策的 現象

在這篇論文裡，其普遍的爭論在於知識和科學（作為論述）是一歷史決定（雖然未真正是必然的）的現象。尤其是在爭論透

*①：The Meaning and Social Origins of Discourse on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②：Allen J. Scott

*③：Gould, Peter and Gunnar Olsson, ed.,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Pion Limited, 1982, pp. 141-156.

過地理空間向度所投射出來的社會及財產關係亦即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裡所出現的問題、需要、利益和實踐所預設衍生的都市及區域論述的形式和內涵。這是一個明白地（且非流行地）以知識論（epistemology）作為現代地理學論述之歷史發展的推動力的立場；而非堅稱在空間科學中知識生產的動態（正如所有其他科學的情形）乃是被限定的社會力量所支配。雖然這個立場很顯然地言明就整個科學而言，科學本質上是在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中的一種歷史決定的現象，但恰如其在適當的時候會澄清的，這樣的立場未必否定在任何特定科學研究模式中，其理論和認識論水平的特定自主性（autonomy）的形式和程度。

本文計劃以四個主要階段來達成。首先，探討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一些基本的社會和政治趨勢，以作為確認引發特定形式之都市及區域論述的主要張力的方式。第二，企圖闡明這些論述（及其幾個內在部份）間的關係，以至現代社會的整個動態和不可避免的結果。第三，進行廣面的努力將這些論述理論化為一特定的社會現象。第四，最後對都市及區域科學研究中馬克斯及新馬克斯模式再興起的意義加以簡要評述。而應予注意者，是本文並不企圖去發表在空間和地理論述範域內的詮釋性知識之動態，而替代地是將關切主要集中於陳述現行之社會問題，課題和現實的認知形式（包含技術與人文的兩者）。

二、晚期資本主義、國家干涉和都市及區域科學的興起

• 歷史時勢

順應上述的議題，就在社會結構的現行改變和以空間發展的新問題表現出來的改變方式這兩點上先作描述。這樣的描述提供了探討都市及區域論述的意義、內涵與結構的基礎。且只有按照當前之歷史時勢（historical conjuncture）及從此時勢衍生出之都市及區域過程（包括政治和行政過程）的合一檢查，才可能來討論到塑造與具體化空間論述的特定力量。然後，我們才可以一種立場來解釋站不同空間學域裡現行的知識論辯與範型轉移。

• 晚期資本主義

現代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之印記，乃是國家廣泛地經理著生產與再生關係。這個現象的根源在19世紀競爭式資本主義中國家

干涉的早期宣言中是能找得到的。然而，其決定性的與不可扭轉的歷史面貌是與1930年代後不久的凱因斯經濟策略與福利國家主義（welfare-statism）之最初發展而同時出現（Gough, 1979）。在1930年代之前，尤其是有鑒於1929年的經濟崩潰，它明顯地呈現資本主義的市民社會已無能再挽救其本身持續存在的基本條件，資本主義沒有國家控制和經理範圍的大量擴張，將不能再以高水平的生產和就業來順利推展。除此之外，國家現在亦發覺本身被迫去提供複雜且廣泛的福利方案，以作為建立社會和文化再生產之整體過程之基礎的途徑。國家必需管制經濟循環，為利用不足的資本和勞力單元的更有效用去創造條件，製造可及的大量基礎結構服務（infrastructure service）去承受商品生產的成本，藉著社會經常資本之大量投資和其他的社會控制工具來維持社會關係的穩定，等等。更進一步，有鑒於此，一新干預主義明顯地成為一非空間性之宏觀的社會需要的反映，它亦部份地反應政治上火爆和困難重重的都市及區域問題之壓力，就如同它透過都市及區域政策和計劃方案以局部意義地在實現一般。因此，特別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家已經投注了大量和持續遞增的公共資金到區域發展方案、高速公路規劃和建造、新鎮的關建、公共住宅方案和許多其他的投資領域。如此已導致都市及區域課題愈來愈被人重視，和連結形成一個由分析、科學和政策各層面的論述合成的偶然體系，並期以之作為有效的政治行動的依據。然後幾無可置疑地，都市和經濟地理學（如今吾人所知）、區域科學、空間經濟學以及都市及區域規劃誠如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之開始急速起飛一般，開始在大學和研究機構裡展現其決定性的面貌。

• 國家干預

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十年來，凱因斯經濟策略和福利國家主義其實已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形成為一種明確的和根深蒂固的社會形式，所以一種典型發展形式的市民和政治互動已經發生在他們的社會裡。此一形式即是社經穩定上的重大干擾，會產生不同形式的國家干預，這些形式的國家干預之後又解放出其所創造的新能源，而新的社會問題和困境又是輪番而起。新的問題和困境需要進一步的國家干預及等等，就如一永無止境的螺旋梯般週而復始。譬如：在都市及區域活動的領域，我們可觀察到一系列的問題像工業區位、區域整合、都市成長、住宅、社區

開發和其他等。每當這些問題威脅到整個社會的全體活力時，國家的修正行動無疑地就隨之而至。然而由於國家自身的功能邏輯，這些資本主義的國家只能進行反應式（reactive form）的規劃，而此作法却容易造成社會情境，使新的和較複雜的問題群開始出現（Scott, 1980）。如此的過程會導向永無止境的政府介入社會及經濟生活。其誠如 Pahl（1977：61）曾寫道「國家的持續性和擴張性角色看就要達到了一個水平，在此一水平上其控制投資、知識和服務、設施的分派權力已賦予其本身一種自主性，使其超越以往之催促性和輔佐性的角色。（關於私有資本）」。

所以，在晚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幾乎可以確定地說市場關係的網絡不再能有效協調社會規定的基本體制，相反地，現在的社會穩定性和持續性大體是透過官僚體制的干預來維繫。就這個方面而言，晚期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許可視為孕育一種我們所謂的「國家生產方式」（state mode of production）之初期形式（Szelenyi, 1981）在這個初期的生產方式裡，由國家經營者、官僚、規劃者、專業顧問、學者等所形成的一種「新階級」開始取代舊有的有錢的階級而成為社會權威和控制的主要化身（Gouldner, 1979）。如此最後的結果是一個社會的核心操作原則會愈來愈類似一種經理過程（其本身受到科學、技術和社會心理論述等的中介與斡旋）。

• 都市及區域科學
論述的興起

必須立刻補充的是政府器官之顯著增加的自主性並不意味著政府單純地是為一自我構成的歷史現象。相反地，晚期的資本主義社會之官僚機器愈是擴大分歧，他們的關係以至廣泛而根本的社會壓力愈是明顯。尤其（和就為了現在分析的主要意義而言），當代政治決策的經驗內涵、風格與目標乃是受到兩種非常頑強的社會壓力所限制和結構。在一方面，為了經濟效率和成長的優越利益，晚期的資本主義國家發覺其本身必須藉著技術控制資源，才得以確保高度理性化的動機。爾今，毫無疑問地這就是支配性的國家干預方式，就是非生產性公共支出之財政和政治報應相當嚴重之普遍情形。在另一方面，國家也必須尋求去包括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裡突發在各種不同時機之社會文化壓力和緊張，並且藉著多樣的人性關係方案計劃和社會行政設計來達成此一目標。這些相異的且經常不相容形成的當代經濟和社會管理，以現代社會空間基礎研究中之問題、技術、重點和方法等在學術和政策上的持續

辯論形式，在都市和區域科學中以關鍵性的內在論述（intradiscursive）面貌出現。

三、都市及區域論述的意義和社會根源

• 都市及區域科學 論述形式與資本 主義社會時勢的 關係

都市及區域科學處理資本主義社會及財產關係透過地理空間向度的投射而被提出來的問題。但我們可能問的是究竟是什麼決定了這些問題的具體內涵？和是什麼力量塑造和再塑造了圍繞著這些問題所建構之答案的偏見、觀點和理論取向？欲解答上述的困惑，可以根據以上觀察的基礎，即晚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地理學乃是透過迫切需要政府官僚提出補救性的控制和干預的問題與範疇投射出來。而歷史決定的問題趨向、範疇與集體干涉之間的聯結則被一特定形式的論述來作為中介加以斡旋。也許，這即意味著這些論述的形式與具體的社會時機有一些可發現的關係，在這期間它們表現出活力，栩栩如生。在晚期的資本主義社會，就如以下吾人所見，此一特殊關係就是導致於一都市與區域論述的主體，它在（a）技術控制以及（b）人性關係經理，的觀點及旨趣之間一深刻的分裂。現在就讓我們輪流地來處理這些特定的觀點和旨趣：

• 技術控制

首先，現代的資本主義畢竟係一先進的商品生產和累積的系統，其運作產生了一有條件的但充滿問題的地理學。此地理學的主要經驗實體涉及如區域成長模式、都市化現象、運輸過程、不同類的土地使用組態及等等。都市及區域科學家對這些實體的事務感到興趣，以致于關切到整個的社會；換言之，一旦都市及區域科學家提出（以不同方式）威脅到社會持續的活力之真實問題時，他們更能支持商品生產和累積的過程。同時，這些問題是商品生產及再生產之整體結構的一內在地理元素，所以其也加入了此一結構的廣義理性。此即意味著現代社會空間基礎之社會需要的集體經理特性是為科技理性，其以確保（符合流行的社會規範和誠令）著特定資源之有效分派與空間利用。為了追求效率的與科技理性的結果，都市及區域規劃者大量地仰賴技術官僚的方法論（例如：系統分析、益本分析、土地使用及運輸模型），和仰賴空間過程的實證理論（例如：新古典土地使用理論、中地分析和重力模型）。這些方法論和理論的論述提供規劃者對商品生產

之空間基礎作補救控制的工具，以及提供了在生產—工資—消費複合體中處理空間中介地瓦解的工具。更進一步，他們乃是精確地順應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內在客觀的邏輯，即一以貨幣量作為價值和表現之普遍度量的社會。

• 人性關係的經理

第二，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和變得愈複雜時，新的問題要求細緻的社會、文化與心理經理的形式來展現他們本身。一旦社會到達一歷史階段，即人類資源的開發變為一關鍵性與普遍性的公共政策課題及再生產與合法化的複雜過程必須集體來挽救時，新的問題會便出現。此外，這些新問題有部份地是假定在藉著科技理性可以成功地解決實質與經濟規劃課題，而却爆發了進一步混雜著人文的、個人的與主觀的問題。所以，這些新問題現在也將本身投射為一論述形式，即它們在關於價值、主觀意義、相關性等理論和哲學式思考的偽飾下產生意識型態的效果。例如：1950年代和1960年代，北美的城市內都市間高速公路的大量和以科技官僚為主之發展就破壞許多既存已久的市中心鄰里網絡。它亦對都市環境品質造成相當的毀壞，當黑人、窮人、老人與其他弱勢團體以空前未有之規模被迫讓出家園作為對高速公路用地時，他們負荷的苦惱却毫不被所感知。其結果是逐漸增長的許多都市居民的疏離感，和都市生活的憤怒似乎變得愈機械化和無法控制。出於這些感受而凝結成各式各樣不斷可以聽聞到的激進之都市政治運動。而這些運動的壓力則迫使許多都市規劃活動產生重大轉向（包括辯護式規劃、民衆參與、分權決策等程序方法的官僚體制內化），且在1960年代末期與1970年代初期很成功地使北美都市行政較之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初期，明顯地變得較有彈性和開放。這些壓力和改變隨後引起對當時盛行之都市規劃理論方面榮的不同方式的補遺的回響（Lemon, 1978）。

• 再生產與合法化的問題

綜言之，以科技理性作為社會經理和控制的樣式，會把社會導向不斷的發展，這種發展會不斷解放許多社會和文化實存的問題，而且會出現許多以再生產和合法化為條件的問題。同時地，純科技官僚主義的干預會遭遇超出其字面直接意涵的參考，感情的社會關係，與對主觀的和個人的敵對世界等問題。然後，這對抗為了再穩定現存之都市及區域社會結構則會再產生行政與控制上之不可避免結果。在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國家發覺其本身深陷在介於時常不能調和的和潛在爆發性的政治選擇間，而必然會導

向危機重重之路的困境。正如哈柏馬斯（1976）曾經指出的，挽救科技理性干預的失敗（關於資源分派、生產效率、經濟成長等）將在一般的經濟體系內產生重大的衰退；另一方面，人類關係經理的水準的低落將妥協於再生產體系的可運作性，並且危及既存社會秩序的合法性。

• 晚期資本主義之
國家事務的一體
兩面

當然，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構造中，這些不可逃遁之生活事實（facts of life）明顯地會出現於現代政策和行政論述上。同時，他們圍繞著都市及區域問題，會提供一歷史決定的學術和知識論辯上的基礎；它們（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與生俱現之人類旨趣和政治危機會迫使此一生活事實成為一直接的意識，而且在地理空間的結構和變動的理論裡，一再地以不同的中介斡旋的（有時是扭曲式的）方式出現。相伴而生地，科技理性和人類關係這雙層的需要與規則作為都市及區域控制之形式，於主流的地理學、區域科學與空間經濟學上則產生了爭論理論與認識論的立場。所以，在一個以現世（this-worldliness）與經驗內在化至上的社會裡，就產生了一種涉及科技政策辯護、社會現實之客觀理論的主宰性科學文化以及以實證論（Positivism）等作為日常現實的論述之相對體。關於國家事務引起之社會範疇和概念的問題，現在則出現一種輔佐性且抵銷式的人文論述。構成單一現實的兩重面目，一者是以科技理性表現，另一者則是人類關係取向，然而其相對的實踐、理論、意識型態和認識論却如一體之兩面，而非彼此絕對地疏離。這個現實本質上是晚期資本主義為了確保持續的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而介入之政治干預的不可避免結果。此一現實之兩件事實表現了被要求引至再形成的社會構造中根深蒂固的問題與經理的任務。此外，就此概念而言，那就是如今吾人所了解的歐克海默（Horkheimer, 1976）之簡潔觀察：「知識活動只是勞力分工的一要素，亦即是社會總體生產中之一可運作元素。」直到我們了解此一情況，則主流都市及區域科學中之有意義與重要超越才可能不斷地被阻止下來。

四、實踐、知識與社會

• 知識、歷史與規
劃

在空間分析、區域科學、經濟地理及相關學門的論述裡，知識在本質上是一種具體的社會問題及利益的集合效果，這些問題

及利益本身就是占優勢的生產方式，而且也所以假設有非常特定的歷史特性與形式。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諸如此類具體的社會問題就在都市及區域層面上生存並繁殖起來，隨著社會的變遷，這些問題變得更複雜，需要更有效、更敏銳的規劃干預。

• 知識活動的意義

在這裡談「知識乃社會狀況的效應」，並無意建議知識活動是由一個簡單的基礎—上層結構過程因果地所決定，就像 Thompson (1978) 批評所說的機械式的系儀模型一樣。相反地，知識的文化是完全沒有任何物質意味的因果關係，這種不受拘束的情形乃形成了：(A) 完全自由未受約束的理念體系在任何既定的歷史時刻中出現的真正可能性（及明確的現實性），以及 (B) 知識藉由橫跨不同的生產方式及社會構造而大量傳達。這一點是人類專心於特殊的知識本體的培育與發展的重要因素，否則它將有不明確地延宕的趨勢，除非這些知識的本體提出人類困境的問題而需要一些研究及補救性的干預。與此一評論相符合的是，那些對人類有意義卻是歷史所決定的問題必然也吸引即時而來的知識方面的注意，此乃成為自然科學（來自對自然的物質作用中十分基本的人類利益）真正的發展以及當今心理學的及文化的知識的再興起——這是一個眾多的個人享受閒暇而能夠把這些問題加諸於身上的社會裡個人生活困惑而達成協議的一種工具。同樣的，當都市及區域的問題發展成為一個社會經濟的複合體，而無法有效控制這些足以威脅資本主義整個社會的生存的問題時，都市及經濟地理、空間分析、區域科學等等就以科學的名目開始茁壯起來。

• 知識與社會現實

簡單地說，科學乃興盛發展於實踐的、組織的及管理的方面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在某一既定的歷史行動領域中出現，因此，（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例證此一點），它並不是由區域科學家界定了有關都市內部流通的理論，然後再告訴都市規劃師究竟有那些嚴重的交通問題存在，而是真正的交通問題的具體情形需要特定的知識效應（流通理論），它乃在使得這種理論的發展變得屬於社會的、人文的、較有意義的情形下，提供了存在狀況的說明。同樣的，當地理空間的不調和效應開始介入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更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時，都市及區域的論述就使它成為一種無錯誤的歷史現象。Mannheim (1952: 134) 曾經在他的一本書中寫到：「在任何事情尚未成為一個實際生活的問題之前，它將無法變成一個問題。」而這種實際生活的問題乃引起一些以概念性疑旨